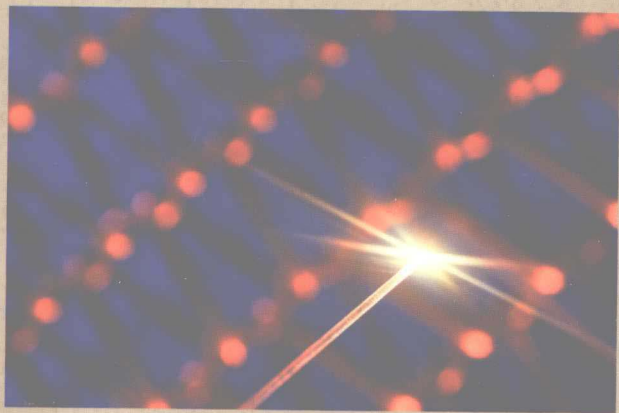


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

武善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武善增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649-0663-4

I. ①文… II. ①武… III. ①文学语言—研究—中国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4545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言 午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钩沉被消逝掉的民族历史记忆

这是一部为了忘却的记忆的历史记忆钩沉著述。

毋庸讳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血痕已经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年轮磨洗得无影无踪了,这一段民族的痛史居然成为某些居心叵测者政治投机的资本,居然成为商品文化翻新的作料,“文革”的历史被篡改,其内涵被扭曲,甚至被美化,无疑是在民族和国家的中枢神经上注入了吗啡,使得国民精神陷入了麻木而癫狂的悲哀之中。

武善增的这部著作不仅是在文学领域的学术和学理角度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清理,而且也从价值观念上纠正了许多年轻人对“文革”本质认识的模糊和曲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文革文学”的学术厘定,就是对“五四”以降“人”的“主流文学话语”的肯定,也就是对启蒙文学的张扬;同时,这也是文学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干预政治、干预文化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不同意作者将“文革”的文学和政治分割开来的观点,其原因就是“文革”中的文学几乎就是与政治画等号的,它在共和国文学发展史上比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凸显其政治性,因此作为一种畸形胎儿的解剖标本,我们是不能将此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

作者希望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切入,对“文革文学”进行深入的解剖,这不失为一种新颖的借鉴方法,因为“尤其是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的研究,必须从文学话语的内部,从文学的本体出发,对其审美形态即叙事形态和抒情形态进行解析。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就必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而成了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这就重蹈了过去相关研究以政治探讨代替文学探讨的覆辙……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它的生成、运作、覆灭的动态过程,与权力的控制是紧密相关的。激进权力派别的形成、激进意识形态的诞生、权力机制的复杂操作,都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发生与演变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不探讨权力对‘文革’主流文学话

语的控制与反控制,就不能深入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生成、运作、覆灭的语境,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建立和瓦解的过程,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审美形态为什么走向了那样的畸形和病态”。

显然,作者在这段论述中透露出了自身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试图将文学从政治主体中剥离出来,回到人们自设的文学幻象中来;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那个无处不在的政治魔影,因为作者也清楚,脱离了那个政治文化语境,避开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文学状况,其研究也就难以为继了。所以作者也认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也在努力打造一种新型的主体,那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上努力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无疑,作者是在否定“文革”中占着文学史主导地位的“地上文学”的价值,而确定另一种价值体系,也就是回到“五四”以人为本的文学主导价值观上来,这时作者就不得不借助福柯的学术体系来完成对那个时代“地下文学”的肯定和褒扬了:“显然,这一打造新型主体的话语事件,也属于福柯所说的现代时期的知识型。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时候,必须从现代性这一理论层面来审视它,把‘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出现作为一个现代现象来予以观察。如何揭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在理论上确证它是一个现代性的话语事件,就成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难题。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本身,就已经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因为过去的许多研究,都是将‘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作为封建的御用文学来看待的,其畸形与变态,被视为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辖、宰治文学的恶果,甚至新近出现的有广泛好评和影响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也认为“‘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照一般人的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文革主流话语”是无现代性可言的,但是,作者所提出的现代性恰恰是一个新的视角问题,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依据“地上文学”背离现代性本质的事实,而重塑“地下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段的理论表述很容易掉进一个怪圈之中而造成某种误读,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清楚作者价值观所在的——回到五四启蒙的现代性原点,方才能够说清楚“文革主流话语”的本质特征。

我以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很难与其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脱离关系,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恒定的价值理念,有没有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有没有一种文化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善增是具备了这样的学术研究素养的,而只有具备了上述的素养,你才有可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武善增不算是那种才华横溢、天赋超强的人，但是他的勤奋、执著和坚韧使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做出常人难以为继的成果来。啃这样一块“硬骨头”，是一般人不愿选取的学术领域，他却磨了十年之剑，终于到了今天的出鞘之日。

从十年前的博士研讨课上的激烈争论，到今天的学术呈现，我只将此序言当做再一次的学术讨论吧。

丁帆

2012年1月23日(农历大年初一)于南京月牙湖畔

目 录

钩沉被消逝掉的民族历史记忆	丁帆 (1)
导 论	(1)
第一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	(15)
第一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萌芽(1952—1960)	(15)
第二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萌芽后的困境(1961—1962)	(36)
第三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破土出世(1963—1964)	(47)
第四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成熟与定型(1966—1968)	(69)
第二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运作	(83)
第一节 主流意识形态的招募与规训:红卫兵诗歌与戏剧 (1966—1968)	(83)
第二节 话语典范的精心型塑与文学生产复制机制的启动 (1968—1973)	(98)
第三节 主流文学生产的流变与政治批判符码的转换 (1966—1978)	(116)
第四节 对“他者”话语的扼杀与自我话语的守护(1968—1978)	(140)
第三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	(160)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	(160)
第二节 “革命”的“新型主体”	(168)
第三节 “合理性”的“祛魅”与“返魅”	(174)

第四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叙事形态 ·····	(182)
第一节	以“神”与“魔”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	(182)
第二节	“特选子民”的“成圣”与“显圣”·····	(193)
第三节	在“大希望”与“大恐惧”之间的“神性救赎”·····	(206)
第五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抒情形态 ·····	(215)
第一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抒情规范·····	(215)
第二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抒情形态·····	(217)
第六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症结 ·····	(228)
第一节	“宏大叙事”中的“活人献祭”与“道德嗜血”·····	(228)
第二节	“新型主体”建构中的“人性陷落”·····	(236)
第三节	“价值理性”的膨胀对文学精神的扭曲与窒息·····	(243)
第七章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覆灭 ·····	(249)
第一节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	(249)
第二节	“他者”话语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疏离与颠覆 ·····	(270)
后 记	·····	(297)

导 论

所谓“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指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出现的、由一定的权力派别设计和强力推行的、表达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话语现象。

在福柯话语理论的考古学时期,“话语”被福柯视作属于历史的一个“事件”:“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差异、内部规则。考古学不是向起源的回归,不是通过话语发现历史,话语就是历史,话语不是媒介,而是事件。”^①在这一时期,福柯强调话语有其自律性,它能够自我做主、自我调适,不受历史实践的制约,这显示了结构主义思想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话语的动态实践过程,认为话语应该被置于历史的变动语境中进行考察,这就摈弃了结构主义教旨式的一个观点——共时性,显示了与结构主义的根本性区别。在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学时期,福柯抛弃了话语的自律性特点,强调话语是在权力的诸种控制系统中形成的,他对话语作出的重新论断是:“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②话语的形式和现实化同权力的控制和排斥原则有关。这样,以话语的权力他律为中心的谱系学就代替了以话语的自律为中心的考古学。总之,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对话语分析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谱系学将权力注入考古学之中,它不再驻足于话语自身的考察,而是从社会制度、权力技术这个层面,来探析话语生产被控制的过程,所以,谱系学不是对考古学的一种简单的否定,

①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3 页。

②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而是对考古学的一种扬弃和深化。

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我们研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方法论的支持。在我们以福柯的话语理论解析“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这个概念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文革文学”这个概念,因为其与“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这个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迄今为止,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文革文学”中的“文革”是一个时间的范畴。王尧认为:“关于‘文革文学’由1966年至1976年的时间设定,依据的是已经为一般人所认可的‘文革’的起(发动)迄(结束)时间,上限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下限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①正是在这样一种时间的框定之内,杨健提出了“公开的文学”与“地下文学”两个含义上相对立的概念:“‘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创作公式。”^②“‘地下文学’特指发生在‘文革’期间,由民众在民间创作的,反映‘文革’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③“‘地下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思想上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创造性”。“‘地下文学’与‘遵命文学’的对峙,本质是两种话语的对峙。”^④杨健的观点对后来的“文革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洪子诚所说的“公开出版的文学创作”与“秘密或半秘密写作、传播的作品”^⑤,陈思和所说的“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与“潜在创作”^⑥,董健、丁帆、王彬彬所提的“显流文学”与“潜流文学”^⑦,其实都是对杨健“公开的文学”与“地下文学”含义的一种呼应和继承,将“文革文学”限定于“文革”十年的时间视阈之内,是其思维的共同特点。

但是,这样一种时间视阈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文革”运动结束即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直到1978年的上半年,这近两年内公开发表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应该如何归类?显然,公开发表的这些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结构和叙事形态、抒情形态上,与文革时期“公开的文学”其实是一样的,但

① 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和研究》,《彼此的历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②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③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④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⑥ 陈思和:《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⑦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按照“文革文学”的时间界定,这些作品不能归于“文革文学”。那么,这些作品是否属于“新时期文学”?虽然在时间上属于“新时期”,但其精神取向和审美形态,又决定了它们无缘于“新时期文学”。除此之外,在“文革”正式发动前出现的小说《欧阳海之歌》、《艳阳天》,戏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等等,在“文革”中是被作为文学“样板”来看待的,但这些作品不是“文革”发动后产生的,而是在1964年后直至“文革”发动前,陆续涌现出来的,如果按照“文革文学”的时间界定,这些作品自然也不在“文革文学”之列,而是属于所谓“十七年文学”的范畴,但事实上人们又分明将它们视作“文革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谈。之所以出现上面这样一种矛盾现象,症结在于研究者仅仅将“文革文学”视作“文革”政治运动的衍生物和附着体,而没有将“文革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现象去看待,这就造成了以政治分期生硬地宰割文学史的尴尬局面。

我们以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观察“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的创作实践,发现“地上文学”其实是一个话语事件的构成部分,这个话语事件开始于1964年夏季北京举办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结束于1978年下半年大量新的文学话语的出现,它所持续的时间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十年时间所不能涵盖的。我们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来指称这个话语事件。这里的“文革”,只是借用了政治运动的“文革”这个能指符号,就像“五四文学”借用了五四运动的“五四”这个能指符号一样,这个能指符号只有与后面的能指“主流文学话语”联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概念。

从福柯话语理论的考古学立场进行观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有其自律性和自足性的特点,这种自律性和自足性,表现为它有自己的话语主体、话语语境、话语规范、话语形态。“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主体是代表着激进意识形态的权力派别,话语语境表现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中苏论战促成的中国国内激进意识形态的产生,话语规范表现为“根本任务”论、“文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创作原则论等一整套话语规约体系,话语形态表现为以样板戏为典范的一整套模式化的叙事、抒情形态。从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学立场进行观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运作、覆灭,与权力机制和权力技术的控制、选择、组织、再分配有关。一定的权力派别按照激进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设计、组织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产,同时建立了一整套文学话语的规范,对不合规范的他者话语进行残酷的剿杀;权力网络的变动、权力重心的迁移和权力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也呼唤、选择、组织着另一文学话语或曰

他者话语的悄然诞生,他者话语在与新的权力话语达成的默契和呼应中,对旧的文学话语——“文革”主流文学话语,逐渐形成了一种疏离和颠覆。

可见,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考古学立场和谱系学立场,已经为我们研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预示了基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的独立性、自律性和自足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主体、话语语境、话语规范、话语形态展开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的研究,必须从文学话语的内部,从文学的本体出发,对其审美形态即叙事形态和抒情形态进行解析。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面,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就必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而成了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这就重蹈了过去相关研究以政治探讨代替文学探讨的覆辙,而失去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最基本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它的生成、运作、覆灭的动态过程,与权力的控制是紧密相关的。激进权力派别的形成、激进意识形态的诞生、权力机制的复杂操作,都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发生与演变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不探讨权力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控制与反控制,就不能深入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生成、运作、覆灭的语境,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建立和瓦解的过程,不能理解“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审美形态为什么走向了那样的畸形和病态。所以,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考古学立场和谱系学立场,我们都应重视,不可偏废。将福柯话语理论的考古学立场和谱系学立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进行“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

不仅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我们提示了基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他的知识考古学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问题的追问:“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历史的事件,它究竟属于福柯所分析的哪一种“知识型”(episteme)?

福柯认为,任何话语事件,都隶属于一定的知识型。在福柯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三种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期的知识型,现代时期的知识型。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相似”,在这一时期,符号本身不是透明的,符号本身成为模糊世界的一部分,获取知识只能是对符号的破译和解释,知识的目标是对秘密的窥视和发现,这种深度知识

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深度,不像现代时期的知识深度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深度。人们的注意力消耗于大千世界的无尽秘密之中,人的隐藏秘密不可能被单独而理智地探究。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符号对事物的“表象”。符号对事物的“表象”,也是符号对事物的“再现”,符号与事物之间以一种透明的方式连接起来,人只是一个澄清者,世界的秩序与人无关。知识只是关于事物及其秩序的,而不是关于人的,人还没成为知识捕获的对象。也就是说,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没有人的位置,人还在知识的黑夜中沉睡。当现代思想抛弃了知识的再现领域,而将注意力转向再现领域的根源和起源的时候,主体作为表象或再现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被凸显出来,康德完成了这一先验认识主体的揭示,他在一系列提问“我能认识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被允许希望什么?”之后所追加的著名的提问“我是什么?”,完成了主体的哲学奠基礼。此时,人不仅是一个再现主体,而且成了知识捕获的一个对象。“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哲学对象,在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断裂的缝隙处降生了。由于知识型的更替是一种非逻辑无规则的突变、断裂,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出现也是偶然的。所以,在福柯那里,主体只是话语构成的副产品,它根本不是意义的来源。人作为主体的出现,是一个话语事件,它属于现代时期的知识型。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作为一个话语事件,也在努力打造一种新型的主体,那就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上努力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显然,这一打造新型主体的话语事件,也属于福柯所说的现代时期的知识型。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时候,必须从现代性这一理论层面来审视它,把“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出现作为一个现代现象来予以观察。如何揭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在理论上确证它是一个现代性的话语事件,就成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难题。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本身,就已经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因为过去的许多研究,都是将“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作为封建的御用文学来看待的,其畸形与变态,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统辖、宰治文学的恶果,甚至新近出现的有广泛好评和影响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也认为“‘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①。

从这种理论抱负和学术目标出发,我们运用利奥塔、福柯、韦伯的现代性

^①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理论作为观照视角,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进行了深入的透视和揭示。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包括三个方面:个人主体、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说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①这里的“大叙事”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另一种译法。利奥塔有时也以元话语或元叙事(meta narrative)指称宏大叙事:“我用现代这个术语指称所有根据某种元话语为自己立法的科学,它们明确地求助于一些宏大叙事,如精神辩证法、意义的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以及财富创造说。”^②利奥塔认为,西方存在着两种最重要的宏大叙事,它们分别是法国的启蒙叙事和德国的思辨叙事。“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以上两种叙事合法化的模式中,左右摇摆。”^③利奥塔从 1792 年之后欧洲现代历史里,对叙事合法性的源头进行反思,认定这一“合法性的源头”是“民族”这一理念,“民族国家”的诉求也是一种宏大叙事,所以,“民族国家”就成了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用利奥塔的这种现代性理论来审视当代中国的状况,我们发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是融为一体的。马列主义和 1949 年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齐一化(homogenisation)提供了历史动因、神话过程、文化结构和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用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还能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民族国家”的志士仁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因。“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与“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融为一体的现代性诉求,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打上了深刻的精神烙印。

与利奥塔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宏大叙事相联系,福柯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属于现代知识型的范畴,因为它既没有意图打乱 19 世纪的“知识排列”,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怕只是悄悄地改变”^④。属于现代知识型的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新型的主体。说它是新型主体,是因为它是阶级主体,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但这个新型主体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统一的构造性主体(constituent subject)。康德以后,“主

① 让-弗·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共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9 页

② 秦嘉清:《让-弗·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4 页。

③ 让-弗·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17 页。

④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41 页。

体”一直是“人”这个概念的基础,主体是客体世界的中心,而人则是历史的中心。福柯从他的知识型理论和后现代立场出发,石破天惊地认为“人”作为主体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话语事件:“人可能只是物之序中某种裂缝,或者,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构型,其轮廓是由他近来在知识中所占据的新位置所决定的。……一旦人类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①。长期支配西方思想的主体观念,在福柯那里是虚妄不实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新型主体,在福柯所认定的知识序列中,仍属于现代知识型的范畴,所以也是虚妄不实的。这种虚妄不实的主体构想,也反映在“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刻意打造和精心营构之中:“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②可见,对“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种新型主体的激进构想,说明“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具有现代性的文化根源和精神特征。

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定样板戏和“文革”时期的地上文学属于前现代的文化性质,原因之一是认为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涵“基本上都是一些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都属于反现代意识”,“其中充满门阀观念、血统论,充满英雄崇拜与个人迷信”。^③诚然,英雄崇拜与将领袖人物视为救世主予以歌颂,确实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出现的一种突出的现象。但是,这种个人迷信、蒙昧主义的现象不唯封建文化所独有,韦伯认为,现代文化也会出现奇里斯玛型(christmas)人物,这是现代性对世界“祛魅”之后的“返魅”效应。韦伯以合理性扩张为中心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和建构,合理性行动又分工具(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类。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它造成的“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正是现代文明的症结之所在。卢梭苦心经营的那份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试图与启蒙运动主流学派的工具理性组成人类精神平行飞跃的双翼,当“合理性”之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走向膨胀,作为“暴君”的工具理性被送走了,作为“独裁者”的价值理性却统辖一切,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奇里斯玛型人物的出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中“高大完美”、“通体透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塑造,这种由“人”而

①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革命文艺》,载《人民日报》1974 年 7 月 16 日。

③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神”的主体营构以及领袖人物成了新的“救世主”被顶礼膜拜，正是“合理性”之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走向膨胀所必然带来的“返魅”效应，这也是现代性文化的一种鲜明的表征。

以利奥塔、福柯、韦伯的理论揭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目的是确证“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具有现代文化性质，这就为我们从现代性的文化视野出发，进一步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与精神取向，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石。

以韦伯“合理性”之“祛魅”与“返魅”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和解读“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我们发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对世俗历史采取了一种或隐或显的宗教修辞方式，它所言说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超世的上帝却有神性存在的世俗寺院。其实，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奇里斯玛的“返魅”现象，与福柯意义上的主体建构的话语虚妄，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联系。因此，从由“人”而“神”的主体性虚妄和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带来的“返魅”这双重的现代性理论视角出发，本书借助于一些宗教修辞方式，提出了一套名词术语，搭建了一个形象化的解读框架，用以表现和解读“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话语形态。这一研究工作，仅求以形象化的框架和修辞方式客观完整地展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叙事形态与抒情形态的基本面貌，不进行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不做价值尺度的介入和评判。

在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叙事形态时，本书以“神”与“魔”之间的对立来对应“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以“特选子民”的“成圣”与“显圣”，来与“无产阶级”成长为“工农兵英雄人物”相对应，以“神性救赎”来与挽救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相对应。从“无产阶级”之“特选子民”到“无产阶级英雄”之“神”的“成圣”过程及其“显圣”效应，构成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重要的叙事形态。在这一重要的叙事形态中，“精神上帝”——“文革”主流政治理念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抽象出来的“社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理想”之价值理性，居于一种隐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冥冥之中操纵着由“特选子民”到“神”之“成圣”的全过程，并时时在这一过程中“显圣”。“精神上帝”经过对“特选子民”进行“资格认定”、“圣徒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诸环节，最后举行“命名仪式”，“特选子民”到“神”的“成圣”过程才算全部完成。此外，“精神上帝”对“邪魔缠身”之“子民”的“神性救赎”，构成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另一个重要的叙事模态。“精神上帝”通过“恢复免疫力”、“激活神性抗体”、“祭起法器祛邪”、“痛下针砭”诸环节和措施，对“邪魔缠身”之“子民”进行了不懈的“神性救赎”。当对方出现“痛哭

流涕”的“肉身反应”时，“精神上帝”的这种不懈的“神性救赎”才算宣告成功。在展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抒情形态时，本书结合“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抒情规范的形成，对抒情话语的象征结构、象征符号、抒情主体、抒情环节、价值取向进行了考察，并据此对学术界久已形成的一些成见进行了颠覆，如有研究者认为天安门诗歌是“知识分子对‘文革’的一种反抗”，而“只有当文学能够对‘文革’作出批判时一个新时期才能到来”，这就是天安门诗歌“在由‘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过渡中所起的最大作用”。^①，还有的研究者直接将天安门诗歌视为“新时期文学的潮头”，认为天安门诗歌“吹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②事实上，穿越表象的批判符码的重重迷雾，深入天安门诗歌抒情形态的内部进行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天安门诗歌仅是“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寻常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已，对天安门诗歌一厢情愿的误读和过分的拔高，是不合于文学史之真实境况的。

以形象化的框架和修辞方式展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叙事形态与抒情形态的基本面貌，本身就是以韦伯和福柯的现代性理论进行观照的结果。这在逻辑上，是在确立“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现代性性质之后，继续在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上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一种推进。同时，这也是通过福柯话语理论的考古学立场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结果。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有其自律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形态面貌进行的客观、真实、全面的呈现，是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自律性和自足性的一种展示。不进行这样一种呈现和展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就不是文学话语的研究，而很可能直接走向政治话语的研究。

前面说过，在展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叙事形态与抒情形态的基本面貌时，不做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和价值尺度的介入和评判，目的是尽可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呈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形态面貌，但是，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最终应该彰显出一种价值立场和精神、美学的评判标尺，否则“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就失去了学术价值和意义。所以，在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形态面貌之后，在后现代的理论视野上，以“文革”主流文学叙事形态、抒情形态的考察提供的“路径”和“桥梁”为依傍，以文学是人学的精神立场和美学评价标尺，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症结进行理性审视和深度分析，就成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的逻辑必然。

① 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和研究》，《彼此的历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1页。

②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7页。

后现代理论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革”主流文学话语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事件,它所存在的精神与审美的症结也必须通过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予以揭示。当我们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问题放置于宏阔的后现代理论的视野上,发现“文革”主流文学话语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时时在上演着“活人献祭”与“道德嗜血”的人间惨剧;其“新型主体”建构的目的是求得“人性新生”,结果却导致了人性阵地的全面陷落;压倒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膨胀,造成了对文学精神的严重扭曲乃至窒息。这种后现代理论视野的考察,也渗透着文学是人学的价值视角和精神立场的观照。

三

如果说,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根源、现代性的话语形态面貌、现代性症结的理论考察,更多的是采用了福柯话语理论的考古学方法,即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视为一个静态的具有自律性和自足性的独立的话语现象,侧重从“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内部构成进行研究,那么,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运作、覆灭的考察,则更多的是采用了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学方法,即将“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衍生变化的话语事件,侧重从“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外部影响即权力作用方面进行研究。

“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52年至1960年的萌芽期、1961年至1962年萌芽后的困境期、1963年至1964年的破土出世期、1966年至1969年的成熟与定型期。福柯说:“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经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东西被消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什么样的修改?”^①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的生成而言,激进的权力派别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制推行的“反修防修”、“紧抓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念,就是福柯所说的“非文学的话语”,或者说是一种权力话语,这种权力话语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对文学进行了改造和控制,就形成了文学话语。

这种权力话语也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生成之后的运作进行了渗透和控制,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权力意识形态对红卫兵文学思潮的招募与规训。1966年至1968年出现的红卫兵诗歌与红卫兵戏剧,话语的主体

^①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1页。